



焦裕禄与故乡的不了情

□ 贾青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今博山区）北崮山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在1955年12月26日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中，焦裕禄这样概括自己的家庭和学习情况：“从出生到15岁，家庭有15口人，15亩多地，牛两头，骡子一头，房子20余间。全家依靠种地生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是外债。”“8岁入本村小学，12岁学校毕业，进入南崮山第六高级小学，15岁高小毕业。”在南崮山和北崮山这段时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也最艰辛的岁月。

在学校阶段，焦裕禄天资聪慧、学习刻苦，很受大家喜爱。北崮山下有一眼清泉，因附近有一户姓阚人家，得名阚家泉。焦裕禄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耍，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在作文《阚家泉的风景》中，他曾这样写道：“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流经南崮山我的学校，奔向山外的天井湾去。我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蛟龙是怎样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由于这篇文章风格质朴沉稳，写景状物很有情感和文采，焦裕禄一时间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焦裕禄的爷爷得了一场重病，在本村财主家借钱才抓了药，家境更加贫困，他被迫辍学。1937年底，日寇占领博山后，焦家又相继遭遇了父亲被逼上吊自尽、爷爷因病冻饿而死等一连串的打击。1942年6月，焦裕禄自己也被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抓到东北做苦力，九死一生，最后在工友



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1943年7月回到家乡后，焦裕禄又因为没有“良民证”无法立足，不得不携妻带子逃难到江苏宿迁给地主打长工。直到1945年8月宿迁解放，焦裕禄才回到家乡并参加革命。

由于表现积极，1946年1月，焦裕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焦裕禄参加了民兵连，在县区武装部领导下，多次参加对驻扎在北崮山村西边10里的岳家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不久，焦裕禄随民兵连调鲁中武装部，配合主力参加了莱芜战役。莱芜战役胜利后，焦裕禄回到家乡正式脱产参加了区武装部工作。1947年7月，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逆转，焦裕禄又随军南下来到河南，这一走就是17年。

焦裕禄到河南后，先后担任尉氏县彭店区区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陈留团地委宣传部部长、郑州团地委第二书记、洛阳矿山机械

厂一金工车间主任、尉氏县委副书记、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等职。但无论身安何处，焦裕禄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和年迈的母亲，经常接母亲与自己小住，给家乡的亲人写信，但却终因工作繁忙，很少再回去。由于长期的过度操劳，焦裕禄的身体每况愈下，1964年春节前夕，他觉得有必要带着孩子们回家一次，认认门，看看奶奶，给爷爷上上坟。临行前，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过于“寒酸”，他还特地找到了县长程世平借了300块钱。

1964年2月11日至28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焦裕禄带着妻儿回到了梦回萦绕的故乡，这是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故乡。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后不几日，焦裕禄就逐一拜访了他的同学和民兵战友。在战友王西月的家中，他们忆起了共同战斗的岁月，按焦家族里的辈分排序，王西月还算是他的小爷爷。他还凭借自己在尉氏、兰考治荒造林

的经验，与这位已经是生产队长的小爷爷谈起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绿化荒山的问题。他们兴奋地走出院门，指着白雪装点的崮山、岳阳山，排兵布阵、攻城略地般地“纸上谈兵”；他要求小爷爷春日开始封山，将山顶的四周搞起木材料，将山下的土厚处搞起经济林——桃树、梨树、苹果树，满口清甜，满心花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冬日就要带着兄弟爷儿们上山，垒石堰，修梯田，平土地，刨草荒。他还提议在上坡的田间打几眼井，以便灌溉那里的旱苗等等。他心里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事情。

走亲访友之余，焦裕禄还按照中国人的年节习俗，带领全家老小，由侄子焦守忠带路，来到了位于村西北角的焦家老林地。他指认一个个坟头，向妻子、向儿女介绍着名字和与每人的血缘关系。最后，站在父亲的坟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爷爷是怎么死的吗？是被地主逼债上吊死的。那时候，咱们全家吃的都是清水煮野菜。你们的大哥哥叫小连喜，也是在逃荒讨饭路上连冻带饿病死的……”说到这里，也许是眼前又浮现了小连喜惨死时的情景，他停了好半天，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那孩子要是还活着，今年该有20岁，一个真正的山东大汉了……”

相聚的时间很短暂。春节还没过完，焦裕禄就被一封电报叫回了兰考。离开前，他又特意骑着自行车在村庄的周围转了一大圈，似乎是向自己的故乡作最后的告别。回到兰考没有多久，他便病倒了。1964年5月14日，这个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山东汉子，终于停下了他匆忙的脚步，但他对故乡的感情，必将永远铭记在故乡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焦裕禄干部学院）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

1948年的春天，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四平战役，震惊中外。我当时9岁，家就住在四平城里，现在回忆起来犹如昨日。那种从未见过的惨烈情景，至今还没有忘记。

当时，我家住在四平道东三马路和四马路之间的南三纬路，我二哥在四平中学住校读书，经常在家的是我和父亲、继母三人。当时四平只有八万市民，人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城外有水壕，城里有碉堡，八路打不了。”人们都知道这是陈明仁在打肿脸充胖子，吹牛而已，实际最后的一次战役只有他的八十八师在这里勉强支撑。我们住的那个杂院，大概有十来户人家，家家都在大院里挖了防空洞，我家和邻居那姑家合挖了一个，大约深有一米八，长有五六米，宽一米多。上面用木板、树干等杂物盖起来，在最上面铺上很厚的土。进洞台阶是南北走向，主洞是东西走向。那时，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贴上米字纸条，防止震碎玻璃。一听到枪声炮声响起，人们都迅速地钻进各自家里的防空洞。这种避难所，可以预防一般的枪弹，真若是炮弹落下，那肯定是没有用的。有一次，我们两家七口人都钻进洞里，空间很小，四个大人只能坐着，两家三个八九岁的孩子待久了，免不了十分困倦，困了就躺在里面睡着了。关键是得带进食物和饮水，大人还可以忍饥挨饿，咬咬牙、熬一熬，不太懂事的几个孩子，忍不住嗷嗷叫苦。那一次，我母亲事先装了一筐玉米面贴饼子，准备进防空洞挨饿时充饥，但进防空洞时由于过分慌张，忘带了那筐饼子。过了一天一夜没吃的，大家都饥肠辘辘，再返回家里，那筐贴饼子已经不翼而飞了。这样艰难的日子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

解放四平那天，我们两家人还在防空洞里。枪炮声已经停止了一些时候，正想要出去，只听防空洞门口有人高喊：“你们赶快出来，不然我们要往里面扔手榴弹啦！”两家七口人从防空洞里出来，那个解放军战士手持冲锋枪，看到我们都是普通市民，就让我们各自回家。这时，只看到北面的墙头上，有许多解放军端着步枪对着大杂院，虎视眈眈，他们在一个院一个院地搜索残敌。战役结束了。

进城的解放军军纪严明，很快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我们邻近的院落驻扎着解放军的一个宣传队，他们朝气蓬勃，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帮助市民担水。他们能歌善舞，不断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他们充满胜利喜悦的笑容和嘹亮的歌声，给这个苦难的城市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当时，市民的生活都很艰难，由于长期战乱，粮食（米、面）、煤炭极度缺乏。天气寒冷，取暖无煤可烧也是个大问题。因为东北沃土盛产大豆高粱，大豆倒是多得是，市民一时间竟然用大豆当煤炭。我们家和邻居家就都往灶膛里一锹一锹填大豆，里面噼噼啪啪地响着，呼呼地冒着火苗，大豆有油，特别容易燃烧。刚刚经过激战的四平城遍体鳞伤，到处是断壁残垣，没有

四平记忆

□ 陆钦

炸响的炮弹、手榴弹，经常会在路边发现。市民们外出随处可以捡到步枪冲锋枪弹壳、炮弹皮和一些从未见过的金属物件，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可以卖废品换钱。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两名学生就被这些危险物炸死了。我记得，学校校长当天在全校主持了哀悼仪式，他嘱咐全校师生，战争刚刚结束，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接触弹药之类的危险东西，有特殊情况要及时找人民警察，报告公安局。我们的班主任，犹如慈祥的母亲，特别尽职尽责，她苦口婆心地对天天进行安全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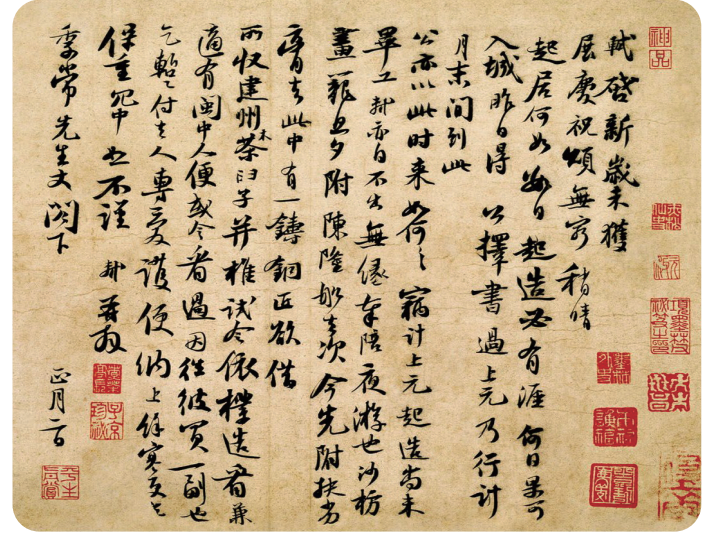
城市恢复建设很快搞了起来，物资匮乏的局面也逐渐改善了。四平解放之初，学生们经常参加义务劳动，搬砖运土，帮助政府和市民整理战役留下的痕迹。在郊区，我看到北山岗上有很多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坟墓，大片的坟墓布满了整个山岗，每座坟前竖着木牌，用毛笔写有烈士的姓名、职务。四平市里的道里新命名了“仁兴路”，以此纪念一位为解放四平而壮烈牺牲的我军高级将领——马仁兴师长。四平的解放来之不易！后来我在党史资料中得知，解放军总计伤亡4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的流血和牺牲。此后的一年年里，四平的市民经常自发地去为烈士们扫墓、献花，纪念为解放这座城市献出生命的英雄。

那一年，我9岁。大概是一个孩子对周遭社会，开始初步理性思考的年龄，而这种初步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我儿时的记忆，第四次的四平争夺战，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尤其深刻。70多年过去了，作为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老人，我亲眼看到过旧中国的贫困落后，亲身经历了战乱中的痛苦生活，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繁荣发展。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永远铭记他们。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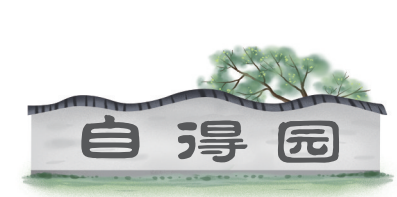
《新步展庆帖》 苏 轼



为，刻苦练习是书法登堂入室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只有把对文化的思考与理解，与书法创作融合在一起，用文化底蕴去滋养书法的精神，艺术的境界才得以升华和跃迁。黄庭坚对此观点颇为赞同，他赞道：“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苏轼虽不是宋朝书风变革和创新的首倡者，却是“宋四家”中最具表意风格的书法家。在他的影响下，宋

代尚意风格的书法更具有抒情表意的功能，而显得更富有人文气息和生命活力。苏轼等宋代书法家把书法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此后书法风格发展得更加丰富多元奠定了根基。



『我书意造本无法』

苏轼『尚意』的书法观

□ 陈振熙

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创作者的个性不同，书法的风格自是各异；而由于创作者所处的历史年代不同，书法也必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风格气象。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写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书法的艺术风格进行断代划分，大体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梁巘的点评比较精准地抓住了不同朝代书法的主流风格特质，且用极简约的语言进行了概括，所以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可。

关于“尚意”的含义，苏轼在一首七言诗中作了形象的表述。熙宁元年（1068年），苏轼自陕西凤翔任满还朝，途中在好友石苍舒家过年。石家收藏了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真迹，藏放书帖的厅堂取名“醉墨”，遂邀苏轼作诗以记之。苏轼回到汴京，便写了《石苍舒醉墨堂》寄给他，其中一句诗写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在诗中揶揄了临池苦练的东汉书法家张芝，表达了对率意任情书风的极力推崇。

晋人尚韵，而唐代书法逐渐摒弃魏晋柔美的韵味，尤其在楷书创作上，更加讲究笔画起、运、收的技巧，更加追求结字的整齐匀称，形成

了法度森严、雄健刚毅的整体书风。这种风格的变迁，适应了大唐盛世的时代需求，也有利于书法的推广与普及。然而，当整体风格愈来愈被强化，成为潜在的创作规范后，必然导致用统一的刻度去衡量美的标准，限制了书法自由创作的空间。

宋人尚意，源自对唐人尚法的变革，似乎符合了物极必反、穷则思变的发展规律。苏轼是书法变革的倡导者和先行者，虽然他不像米芾那样撰写书论专著《海岳名言》，对唐楷大加批判，但从其涉及书法的诗词以及对朋友的对白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尚意”的书法观。苏轼及其周围的一些书法家排斥唐代官廷书风洗练笔法及匀称结构，主张上溯唐以前的古朴自然风范，且尝试用不美的、质朴的特色来创建个人书风。书法在他们眼里成了“有书无法”，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直言道，幼安弟（黄庭坚内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

提倡“无法”，让宋人得以跳出古人的条条框框，凭自己的敏感与知觉进行创作，进入“鸢飞鱼跃”的极度自由状态。苏轼云：“诗不求工，字不求奇，天真烂漫是吾师。”认为不去推敲笔画和结字的规则，任由性情，放手去写，不求工拙、无谓美丑，往往

能收获超乎寻常的创作效果，而他的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便是最好的例证。就单独的字而言，后世的书法家大多认为，《寒食帖》算不上佳作，有些字因笔力不到而显得不够饱满完整，但是就整幅作品而言，苏轼写得萧散随意、清旷简远，与其当时悲寂寥落、孤独凄苦的心境十分贴合。

如果一味强调“意”，而忽略“法”，则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让书法创作演变为可以被肆意突破和改变的艺术形态，并引发艺术价值评价的庸俗化。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就曾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但苏轼并没有对“意”进行随性发挥，而是将“意”与“文”关联在一起，提出了“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在苏轼的审美理论中，书与画是一体的，所有关于绘画的评论也基本适用于书法，所以他认为文学用以表达思想，而书画用以抒发胸臆，“自适”“自娱”应成为文人书画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与宫廷书画家重在展现笔法和技巧形成巨大差异。

既然书法与文学相通，要提高书法的造诣，就必须增强文学素养，加深文化积淀。苏轼诗中写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认为